

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①

徐以骅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各种跨国宗教运动和现象风起云涌，其中国际传教运动的突飞猛进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宗教布局，而且对人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看法和理论范式形成了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学界对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提出“国际视野、当代关怀”以及实现“四个跨越”的研究设想，以对全球宗教复兴作更加全面的学术回应。

关键词：当代国际传教运动 宗教与国际关系 “四个跨越”

作者简介：徐以骅，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宗教复兴不仅发生于传统世界性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也发生于传统地方性、非建制性、民间性和新兴宗教（如印度教、巴哈伊教等）。全球化和网络媒体进一步造成和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运动。在这些宗教运动中，国际传教运动的突飞猛进尤引人注目，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宗教布局，而且对人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看法和理论范式形成具有颠覆性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学界对传教运动尤其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实现以下“四个跨越”的研究设想，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从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历史到传教运动现状的“旧与新”之间的跨越

对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研究重历史轻现状的现象十分严重，国内的传教史研究往往缺乏对现状的关照，尽管目前国内宗教学者如卓新平教授对当代基督宗教的发展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②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宗教复兴造成了基督宗教传教运动从全球处境、运动方向到传教战略等方面的巨大变化。^③用美国著名福音派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的话来说，就基督宗教而言“在过去50年里人们见到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宗教重新分布”，而基督宗教的未来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④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一举摆脱二次大战以来的颓势，迎来了继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

^①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以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外交”项目的中期成果。

^② 其中尤值得重视的是卓新平所著《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③ 从宣教学观点看待当代传教运动发展趋势的著作可参Michael Pocock, Cailkyn Van Rheenen and Douglas McConnell, *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Missions: Enga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5)。

^④ 华理克称在1900年，全世界71%的基督徒居住在欧洲，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28%，而实际上教堂的基督徒的比例还低得多（类似的数据经常出现在西方教会以及学术性出版物上）。“The Future with Evangelicals: A Conversation with Pastor Rick Warren,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http://perforum.org/events/?EventID=221>。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所说“伟大世纪”(19世纪)后的所谓的“更伟大世纪”或“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在基督徒人口分布上发生了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转移，在差会背景上发生了从传统/老线差会向福音/新兴差会的方向性转移，在传教领导权上发生了从外国差会到本地独立差会的战略性转移。^① 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② 更多是生活在社会边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而不是来自全球北方富庶国家的中产和富裕阶层；而21世纪初一位典型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已非男性白人，而更可能是女性或其他种族。^③ “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移民教会”、“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的新面孔”和“世界宣教大变脸”的基本内容，^④ 作为传教中心“波士顿和纳什维尔正在让位于汉城(现称首尔)和内罗毕”^⑤。事实上就所派遣的海外基督教传教士的人数而言，韩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⑥

20世纪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大变局还包括五旬节派的崛起。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支力量，^⑦ 在世界范围促进了基督教根基跨文化转移的“文化革命”，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在2亿以上。五旬节派在除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所有地区都获得了规模空前的增长，如在拉美，新教各宗派尤其是五旬节派的增长正在挑战拉美社会天主教会认同的长达五个世纪的历史。^⑧ 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旬节派的崛起甚至“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始”。^⑨ 当然也有学者对“未加思考地使用‘五旬节派’称呼来概括正在增长的世界基督教”这种做法持有异议。^⑩

① 可参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史述评》，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320—350页。

② 引自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③ 其中女性传教士的增加率要远高于男性传教士的增长率，可参涂怡超：《基督教福音派海外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④ 可参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上引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Missions: Enga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

⑤ Dana L. Robert,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Oct. 1994), mhtml: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Local%20Settings\Tempor...(June 9, 2007), p.10.

⑥ 韩国世界宣教协商会(KWMA)称，截至2007年年底，韩国560个教会团体派遣的1.6616万基督教传教士到世界173个国家和地区宣教，规模仅次于美国。而就基督教徒的宣教热情、志愿和牺牲精神而言，韩国堪称世界第一。引自苏恩仙：《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危机为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第10页。

⑦ 即次于天主教和基督教但超越东正教和圣公会的第三支力量。

⑧ 关于五旬节派在拉美尤其在南美和中美洲的发展，可参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s 9 and 10.

⑨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2008年，未正式发表，第5页。

⑩ 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223—224页。

目前断言20世纪是白人主导基督宗教的最后一个世纪还为时尚早，但上述基督教新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新局面确实颠覆了关于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的性质、趋势及其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挑战。由于基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①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发展。如果说，昔日“每位帝国赌博的新玩家都谋求以传教活动的辞令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②那么今天的西方政治和宗教势力则通过“宗教自由”和“宗教人权”议题来介入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教会史取代宣教史，研究世界宣教取代研究海外宣教，新宣教学取代老宣教学而成为学术研究主流，基督教传教运动已由宗派性差传让位于普世合一性差传再过渡到对差传的超越，从过去单一性解释过渡到现在的去中心和多元化的解释。^③抱残守缺地坚持传统的“中心-边缘”、“差会-工场”、“西教东渐”、“基督教扩张史”、“被传教受支配”的研究范式，不仅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当前传教运动的现实处境，也无法充分解释传教运动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从研究传教运动到国际关系的“圣与俗”之间的跨越^④

美国著名宣教史学者比弗（R. Pierce Beaver）曾这样评论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很久，海外宣教仍然是“美国花费最大且最为持续的对其他民族的善心和利他主义的表示，是美国文化在草根层面对于这些民族产生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此后它继续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⑤在20世纪90年代，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基督宗教重心南移论”的主要学者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亦指出：“差传事业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在于国际关系领域”。^⑥然而，除了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史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等少数领域外，^⑦即使在西方学界，对传教运动与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仍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极少有交集与会合，尽管宣教学/宗教学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分别都是中西学界得到最多关注的一些研究领域。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宗教全球复兴正在改变上述“圣与俗”研究分离的状况。各大宗教的全球

① 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221页。

②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p.35.

③ 可参上引Dana L. Robert,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④ 此处跨越“圣与俗”的说法参照Andrew Prest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 5 (November 2006)。

⑤ R. Pierce Beaver, "Missionary Motivation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in J. C. Brauer, ed., Reinterpretation in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vol. 5(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13.

⑥ "From Mis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s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since World War II," p.11.

⑦ 可参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立新：《美国在华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一个初步的阐释框架》，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社会》（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299–320页。翻译著作有李本京主编：《美国基督教会对中国之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等。

性扩张及其所引起的国际社会的大规模“认同变迁”和冲突碰撞，正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传教运动研究也开始走出宣教学和教会史的“隔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所谓主流学术领域的学者展开越来越频繁的对话。鉴于传教运动对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涂怡超把基督教传教运动称为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革命引信”和“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重要因素，认为传教运动在使宗教问题国际化、造成基督教会与民族国家和其他不同宗教/民族之间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对抗等方面有直接作用，并且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因素。^①正如美国《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作者詹金斯（Philip Jenkins）所言，传教和宗教移民运动不仅引起了全球宗教的大变局，而且还可能造成全球政治的大变局。他指出目前在全世界25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至少有10个出现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严重对立的状况，因此这些国家均有可能成为“严重宗教冲突的舞台”。^②当前全球基督教传教重点即多半为“福音未及之地”和“未得之民”的所谓北纬10至40度之窗，^③或目前由华人主导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所覆盖的从东亚/东南亚经中东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就与从北非、中东到南亚的所谓伊斯兰弧形地带或极端主义弧形地带多有交叉重叠，成为宗教冲突的高危地区。此外，基督教传教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对传教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④2007年“阿富汗人质危机”引起韩国社会与教会以及教会内部的对立冲突就是晚近的例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宗教行为体一样，世界性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基督宗教在华的各种差会和华人宣教会，并未因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完全销声匿迹，而是大部撤至港台、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区，这便大大拓宽了“对华宣教”和“在华宣教”的范围，使之成为在一次大战与二次大战期间基督教传教运动国际化的后续发展。^⑤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乃是旨在“传道于天下”（evangelizing the world）的国际传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对受派遣差会调度而事奉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来说，在华宣教并不一定就是其传教生涯的起点或终点。因此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不仅需要沟通“对华宣教”与“对中国文化圈宣教”，而且需要串联“对华宣教”与“普世宣教”，使其具有更宽阔的视野，事实上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对华宣教”的后续发展，如对在华差会和传教士撤离中国及反思经验教训的研究，^⑦但对在华差会和华人教会1949年后在海外的跨地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演化和发展，以及对同一时期在华宣教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宣

① 上引涂怡超：《基督教福音派海外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第16—53页。

② 詹金斯按基督徒和穆斯林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将此25个国家分为六类。见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pp.166—167.

③ 关于北纬10至40度之窗，可参Window International Network 网站：<http://www.win1040.com/>

④ 这方面晚近的研究可参Daniel H. Bays and Grant Wacker, eds., The Foreign Missionary Enterprise at Home: Explorations in North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Tuscaloos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⑤ 关于一次大战与二次大战间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或第一波全球化，可参Dana L. Robert,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naliz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April 2002), pp. 50—64.

⑥ 可参Terrill E. Lautz, “The SV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in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p.3—19.

⑦ 可参上引《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第四章。

教的比较研究，学界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①因此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当代化和国际化具有较大的空间，尤其在备受海外宗教媒体关注的华人“回宣”领域。^②

三、从研究基督教传教运动到其他宗教传教运动的“教与教”之间的跨越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兴和持续发展，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到本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宗教获得了比基督宗教更快的发展以及比基督教新教任何一个宗派更广的分布。^③在欧洲，伊斯兰教和佛教在许多国家已成为继基督教或天主教后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取得了与这些宗教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存在和发展比较相称的地位。在中国和整个华语世界，尽管基督教在19世纪首先开创了大规模慈善活动的先例，目前却是佛教在开展慈善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④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一般关注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尤其是其在华历史，在该领域尤其在基督教高等教育史等方面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研究的中国化”，^⑤相比之下因各种原因，国内学者对其他宗教传教运动的研究就相当有限，^⑥对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巴哈伊教、印度教等东方主导宗教“北上”的研究有待深入，而对“海纳百教”、“无拘无束”、“多元多源”且曾经或正在风靡西方社会的各种新兴宗教/信仰运动如新时代运动^⑦也缺少探讨，传教史实际上几乎成了基督宗教传播史的另一名称。世界上各种宗教都具有自身特点的传教方式和路线，而宗教传播引起的各宗教间的包括相互借鉴和碰撞的互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此外，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传教(或称福传、拓展、拓荒、外展、弘法、弘道、度人等)运动既不依附国家也不借助国力，其中许多宗教在所在国还处于少数派宗教，甚至受压迫宗教的地位，并且与任

^① 见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Transpacific Connections, 1900–1950, pp. 267–269。

^② 关于“回宣”即向穆斯林传福音（广义）或“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狭义）的历史和现状，可参黄剑波：《自西向东：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载李金强、吴梓明、邢福增主编：《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9–256页；Kim-Kwong Chan, “Mission Movement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to be published (2009). 国内关于当代华人教会海外传教活动的个案研究另可参张广永：《“华福”与新传教运动》，载徐以骅等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199–226页。

^③ David Barrett, George T. Kurian, and Todd Johnson, eds., WorldChristian Encyclopedia, 2nd ed.,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可参魏乐博（Robert Weller）著、汪昱廷译：《中国社会的宗教和公益》，提交“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2009年7月）论文。

^⑤ Jessie G. Lutz,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in Peter Chen-main Wang, ed.,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 2007), pp. 119–149.

^⑥ 此类著作有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安娜·塞德尔著、刘凌译：《西方道教研究史》第八章《中国之外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⑦ 关于新时代运动，可参潘天舒：《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美国“新时代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四辑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577–589页；罗伟虹：《美国的新时代和新宗教运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238–254页。

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主义均无瓜葛，这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尤为如此。

四、从研究传统传教到网络传教的“实与虚”之间的跨越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或称“电脑宗教”、“虚拟宗教”）^①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网络对各种宗教的传播都有“放大效应”，大大提高了民众参与宗教活动的数量，^②成为“上帝的麦克风”。由于网络相对较低的进入门槛，边缘宗教团体和信仰获得比以往更大的“曝光度”和“发言权”，这便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信仰团体提供了极大发展空间，并且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网络“世界性”与宗教“普世性”的契合，也使网络宗教具有比以往任何传教方式更有力的穿越疆域国界的能力。事实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至少在虚拟空间上任何地方性宗教都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宗教。目前，网络宗教作为新型传教方式还只是传统宗教活动的一种重要补充，尚不能完全取代实体型传教组织的作用，但其无论作为新型传教主体（电脑空间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yberspace*）还是作为传统传教组织的新型工具（电脑空间上的宗教，*religion on cyberspace*）在当代传教运动中都已显示出巨大的潜力。^③

与继纸面（平面）传媒出现的其他新型媒体如广播和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在提升宗教组织直接传教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它们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网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网络宗教的开放性、虚拟性、跨国性和渗透性也使我国现行的把宗教活动和出版物限于有形空间和实体形式的大部分宗教法律、法规处于滞后状态，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宗教以及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

就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宣教学研究不仅主要限于国内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历史，而且主要基于历史学科，间或也借助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进路。而当前国际传教运动的多元发展，则要求研究者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和“当代关怀”，传教运动研究在学科上也需走出传统宣教学的“隔都”而与国际关系、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作更紧密的结合。总之，鉴于当代传教运动国际化、政治化、多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拓宽传教运动研究的时空范围，加强对当代包括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的传教活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或基础的新传教方式的研究，即实现上述“四个跨越”，是对国际传教运动的更加全面的学术回应。^④

（责任编辑 郑筱筠）

① 费利克斯·威尔弗雷德（Felix Wilfred）：《信息社会的宗教与神学》，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83页。

② 参谢洁、黄平：《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兼论美国宗教的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第409—421页。

③ 费利克斯·威尔弗雷德（Felix Wilfred），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

④ 可参谢洁、黄平：《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多元一体的美国宗教》，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427—432页。

A Few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Islamic Sects

Jin Yijiu

The paper studies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examines and analyses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Islamic sects from their organization, doctrine and ritual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Sunnis have been the major sect of Chinese Islam, the doctrines and positions of the Shi'ahs also spread wide. The Chinese Islam is constituted by the Sunnis and the Shi'ahs together.

Key words: Chinese Islam, Sect, identity

“Four Bridgings” of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Movements

Xu Yihua

The large-scale religious resurgence since the 1960s has brought about all kinds of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phenomenon and movements, and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movements is the transnational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various religions. The fast and robust growth of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ary movements not only facilitate the great redistribution of religions in the world, but also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our traditional views and theories regarding the foreign missions.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issionary movements and also the missi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 research scheme of a series of bridgings (such a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old and new missiology)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religious revivals in general and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ary movements in particular.

Key wor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movement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ur bridging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Knowledge and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Marxist View on Relig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Hu Jintao as General Secretary since the Sixteenth Congress

He Husheng Zhou Shougao

Abstract: Since the Sixteenth Congress of CPC,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Hu Jintao as general secretary proposes the theory of establishing harmonious religious relationship from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emphasizes that all religions should play their roles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encourages religious believers to play their roles i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larifies 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work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CPC should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k regarding religions and make the government do better in this area, which form new understanding and new perspectives of religious issues.

Key words: Hu Jintao,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the role of religion, united front